



C S S C I 来 源 期 刊
全 国 中 文 核 心 期 刊
中 国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核 心 期 刊
人 大 复 印 报 刊 资 料 重 要 转 载 来 源 期 刊
华 东 地 区 优 秀 期 刊
首 届 江 苏 省 新 闻 出 版 政 府 奖 获 奖 期 刊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THE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2014

目 录

政治学研究

- 81 工人政治再释义 陈周旺
- 88 科学评价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的基本原则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双传学
- 94 协商民主:维稳长效机制构建的新思维 孙枝俏,孙 奔

行政学研究

- 99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测评指标设计
——基于地方政府合法性的视角 丁 煌,梁满艳
- 107 案例研究与理论建构:公共行政研究的视角 郭小聪,琚挺挺
- 113 论管理的社会化及合作治理
——对管理外包现象的理论分析 张乾友

法学研究

- 120 论刑事诉讼中的抽样取证 万 毅,纵 博
- 129 未决羁押者劳动权保护的实证调查与理论阐释 周长军,刘 伟

[期刊基本参数]CN32-1562/C*2001*b*16*136*zh*P*¥10.00*3000*18*2014-04

主 编:周善乔
副 主 编:沈利华
主 办 单 位:江苏省行政学院
出 版 单 位: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
地 址:南京市水佐岗49号
邮 编:210009
印 刷 单 位:南京凯德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范 围:公开
国 内 发 行:江苏省邮政局

邮 发 代 号:28-278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邮发代号:1486Q
国内统一刊号:CN32-1562/C
国际连续出版物刊号:ISSN1009-8860
编辑部电话:(025)83382247
(025)83382219
E-mail:Jsxyxb@263.net
定 价:10.00元

工人政治再释义

陈周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全球化时代对工人政治提出了一系列挑战,亟需对“工人政治”这一术语再释义。回溯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工人政治”所指向的工人被赋予其超越职业群体之“阶级”意涵,代表了普遍的解放性力量,“工人政治”也不是单纯围绕某一特定职业群体所发生的权力关系,而是指一种有别于过去长期由政治精英垄断政治生活的全新政治形式,即那种“异化”了的现代政治。工人政治的发展与工业化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紧密结合,以至于当代在西方知识界出现了“工人政治走向衰落”的片面理论。事实上,工人政治不仅没有边缘化,相反正藉全球化而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振兴,这在客观上要求调整工人政治研究的策略和方法,通过工人政治这一剖面,探析现代民主政治的起源与发展,从而透视现代政治的本质。

关键词:工人政治;阶级;民主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4)04-0081-07

伴随工业化时代的降临和发展,工人作为政治主体,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曾经扮演关键角色,“工人政治”一词也被赋予重要理论意义。然而,在工人与资本主义体制抗争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即沃勒斯坦之所谓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心”,全面的、富有政治挑战意味的工人运动逐渐偃旗息鼓。这给我们提出一连串问号:全球化的时代工人政治消亡了吗?工人阶级何去何从?政治是否还与工人攸关?这些就是本文通过对工人政治再释义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回到马克思:“工人政治”即现代政治

“工人政治”不是一个随意的术语。如果我们仅仅把工人当做一种职业群体,那么,并非所有与工人这一职业群体相关的政治社会现象都可以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结为工人政治。一方面,“工人政治”所指向的工人,绝不仅仅局限于一种“职业群体”之范畴,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试图赋予其超越职业群体之“阶级”意涵。当然,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常有重合之处,但理论意义则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工人政治”也不是单纯围绕某一特定职业群体所发生的权力关系,而是指一种有别于

收稿日期:2014-03-26

作者简介:陈周旺(1973—),男,广东阳江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及基层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中国高科技职业阶层政治认同感研究”(12CZZ003)的阶段性成果。

过去长期由政治精英垄断政治生活的全新政治形式。

马克思是第一个赋予“工人政治”这一术语现代政治意涵的思想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异化”这一术语将工人与现代性的权力关系勾连起来。他在书中开宗明义指出:“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P50)}马克思将工人的生活状况喻为古希腊城邦中的奴隶,甚至认为工人的地位连奴隶都不如。何出此言呢?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辩证法”观之,奴隶在强迫劳动中,通过“对象化”自然,至少还形成了自我意识;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得工资的活动,却使工人越来越走向毁灭: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失去生活资料,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这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当然就在于“异化”,即被卢卡奇释义为“售卖”的那个术语:工人的劳动是售卖自己的劳动力。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认为工人是一种革命性力量呢?当然不是因为工人这个职业群体的生活贫困,而是因为工人解放的意义本身就是人的解放:“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PP62-63)}马克思这样去描述“无产阶级”的“总体意义”:

……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任何特殊的权利,……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2](P15)}

换言之,“工人政治”不是特指与工人这一职业群体、社会阶层相关的特殊政治现象,而是

指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区别于封建政治的全新政治形式,正是这种新的政治形式构成了现代国家、现代民主政治最深刻的本质特征。

具体而言,“工人政治”这一术语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层涵义,工人与国家所发生的各种政治关系,在一般意义上凸显出现代政治的“国家性”。在前工业化社会中,农民和城关市民的政治是地方性的,他们甚少与国家发生关系,底层人民的抗争主要针对给他们造成直接伤害者,斗争剧目表现为放火、抗税、打人、抢粮等,其目标是泄愤而不是改变官方政策。相比之下,工人抗争的剧目有了革命性的飞跃。^{[3](P78)}工人斗争的场所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国家统治的心脏地带——城市,剧目是声势浩大的罢工、游行、示威等,这些斗争直捣黄龙,破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市场和政治体系,对统治集团构成强大的震慑。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生产体系、国家财税制度和平等的公民权,在国家与工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互动。工人在国家体制外的抗争,以及在国家体制内的投票,都间接或者直接地塑造国家的政治体制、影响政府政策,甚或创设政治议程,这些抗争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现代民主体制。

第二层涵义,工人的组织与动员,一般意义上泛指以阶级为符号的政治抗争。区别于前工业化时代碎片化的民众抗争,社会化大生产使工人自动实现了集中化和组织化。根据马克思对小农“一袋马铃薯”的判断,如果小农只是一个“自为”的社会存在,那么只有工人阶级才获得了从“自为”到“自觉”过渡的可能性。理论上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到底是生产集中还是居住集中铸就了工人的阶级意识?就此而言,现代工人最重要的政治行动就是结社。这大大加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政治权力,也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一面倒的劳资冲突,演化为资本、国家、工人三方的政治角力。

第三层涵义,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工人与资本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一般意义是指“生产政治”即隐藏在生产组织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有学者称之为“车间政治”,事实上,

对生产时间的控制业已超过空间监控,成为劳动控制的主要手段。^{[4](P92)}从布雷弗曼到马克·布洛维,劳动过程的工人政治理论已经蔚为大观。布洛维更是提出一种“工厂政体”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非布洛维原创,早在恩格斯的工人政治文献中就已经提出),根据劳动控制的方式,他将工厂政体区分为“专制政体”与“霸权政体”,前者是指借助人身强制的控制;后者则指通过“赶工游戏”等管理技术,在意识形态上消弭工人的反抗意志从而制造出“同意”的新控制方式。^[5]

概括起来,“工人政治”主要是指围绕工业化生产所发生的一切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工人政治已经超越社会学层面旨在刻画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其重要意义在于透过工人的政治生存状况来理解工业化社会的政治,这种政治本身就蕴含了现代政治的本质内容。

二、工人政治:消亡还是重塑?

只要社会化大生产还存在一天,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类属群体的工人,就不会消失,尽管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造成工人阶级内部成分和结构的变化。然而,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沉寂;作为一种利益诉求的罢工,虽然并未休止过,但是由于其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给周遭社会生活带来不便,而使之失去声援,失去道义上的感召力,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与诉诸于阶级相比,西方世界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更愿意诉诸一些新的符号来进行包装炒作。克里西的观点道出了工人运动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西欧国家经济的服务部门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工人阶级一般也就在某些国家活跃的劳动力中失去了根基。这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传统基础日渐狭窄,进而意味着这种分裂的动员能力至少在其传统的形式上被削弱。^{[6](P32)}

克里西等人的“新社会运动”理论不过是长期以来“产业工人衰落论”的反响而已。那

些后工业主义理论家、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80年代纷纷以把产业工人阶级开除出历史舞台而后快。彼得·德鲁克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阶级崛起得像蓝领工人那样快,也没有一个阶级衰落得像它那样快”^[7]。丹尼尔·贝尔宣称:“作为劳工的‘劳工问题’不再是主要的了,它也不具有使所有其它问题都沿着这个中轴两极分化的社会和文化影响了。”^{[8](P184)}

马丁·李普塞与克拉克合署发表的《社会阶级消亡了吗?》是一篇代表性的文献,文中声称阶级已经是一个越来越过时的概念,阶级分析则越来越显得不充分。^[9]在李普塞等看来,社会冲突日趋多元化,阶级分化根本不能涵盖社会分层的全部,如果说现时代社会发展存在一种趋势的话,那就是“分层的碎片化”。高兹提出要“告别工人阶级”,认为已经不存在所谓工人的力量,而只有“功能性”的工人;工人阶级的“劳动文化”和“劳动的人道主义”也将随之消逝。^[10]新左派的旗手拉克劳与墨菲夫妇宣布:“工人阶级”这一共有的标签成了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之中的工资形式已经普遍化了,工业无产阶级在数量和重要性上却已经下降了”^{[11](P90)}。

这些观点,都建立在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大变化加以解读、重新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路的基础之上。概括起来,主要形成了三条逐步递进的理论公式:第一,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造成了劳动阶级成分的变化,“用身体来换工资”的蓝领工人不再是一支主要的劳动力量;第二,由于工人工资结构的变化,中产阶级的崛起,脑力劳动者取代了体力劳动者,管理和智力报酬取代了体力报酬,建立在体力工人劳动基础上的“工人阶级”概念失效了;第三、由于蓝领工人本身的边缘化,他们的斗争不再具有整体性意义。

然而,这些理论发现了事实,却难免有提错问题之嫌。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工人政治的消亡,因为劳工结构的变化并未从根本上克服劳资冲突,相反,白领劳工阶层的崛起,使工资计算制度更趋于复杂化,相应地,劳资冲突也以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来。而

且,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地完成,白领劳工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阿瑞基语)也逐渐完成,那种原来把白领阶层与体力劳动阶层加以区分的理论乐观也随之瓦解。在印度、中国这些后发国家的后工业生产体系中,则迅速出现了类似于“蚁族”的白领劳工“无产阶级化”迹象。

其次,即便发达国家劳工阶层的阶级意识确乎存在一个趋于瓦解的走向,也不意味着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分析就丧失了意义,因为社会不平等的事实依旧存在,而阶级不平等仍然是社会不平等的最集中体现,社会不平等结构的“阶级化”仍然是社会政策要极力避免的恶果。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劳资冲突的缓解。相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绥靖的同时,制造业的全球转移反而激起了第三世界劳工政治的大规模复兴,这些国家工人阶级与跨国资本力量之间的冲突显得更加复杂化和白热化。

由此可见,社会与政治理论的使命不是去宣告“阶级消亡”,而是要调整阶级的概念,改变阶级分析的策略,使之与前沿的研究方法相契合,从而更加深切地理解现代国家与政治之本质。此乃一部分学者呼吁“让阶级回归”之目的所在。斯科特·麦克努尔等人主编了一部研究工人阶级的论文集,索性就叫做《让阶级回归》。这个书名很容易让人想起另一部重要著作《让国家回归》。后者是在“以社会为中心”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大行其道之际,由一批坚持“国家中心”取向的政治学者所发起的理论挑战。“让阶级回归”有同样的抱负,作者们通过对欧美主要国家社会阶级的比较研究,使阶级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麦克努尔认为,传统的左派观点对于工人阶级形成持有一种决定论观点,这正是造成工人阶级研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让阶级回归”的理论原点是“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具有或然性,是在特定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语境中建构起来的。由此出发,采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把阶级当作是“一种生动的、多面向的过程”,阶级分析可望重新焕发活力。^{[12](P12)}

无独有偶,约翰·霍尔主编的《让工人阶级重新运作起来》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霍尔承认阶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正面临各种各样严峻的挑战,但是霍尔指出,尽管如此,迄今并没有任何一个替代性概念可以将“阶级”取而代之,因此更重要的工作是将“阶级”概念重新理论化。霍尔自称是采用“新韦伯主义”的方法来进行这一工作,而使“阶级”概念与制度主义分析相契合的。^{[13](P16)}

艾拉·卡兹尼尔森与阿里斯戴德·佐尔伯格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形成》虽未高举“让阶级回归”的大旗,但是其理论影响似乎更为广泛。顾名思义,该著作主要是秉承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理论传统,追问在不同民族国家中工人阶级形成的建构性因素,这使它蒙上了深厚的历史社会学烙印。卡兹尼尔森试图赋予阶级分析更深刻的理论意义,她指出:“无产阶级化乃是现代性的关键主题,阶级对于理解国家、经济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4](P5)}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位工人政治,而不是简单地宣告“工人阶级的消亡”,因为全球化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在此不妨对著名劳工理论学者西尔弗的名言略加阐发,谓之“哪里有工业,哪里就有工人政治”。工人政治并不因为所谓“后工业时代”的来临而消亡,它只是转变了方式、组织载体,或发生了空间上的转移,并且更加深刻地与现代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商品市场等力量交织在一起,成为理解现代政治的重要向度。

三、工人与政治民主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最根本的特征,意味着建立一个非排他的政治体系。然而政治民主究竟是谁来推动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长期以来存在巨大的分歧,称之为“理论战争”毫不为过。

巴林顿·摩尔可谓“资产阶级推动民主”理论的始作俑者。摩尔在他那部名满天下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明确指出民主是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成果。摩尔对民主体制、共产主义体制和法西斯体制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发现,农业商品化是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决定性力量。在英国、美国、法国,农业商品化程度最高,最终导致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土地贵族的力量不是被消灭就是在政治上被削弱,资产阶级提出“不出代议则不纳税”,从而确立了代表制。相反,在俄国虽然也爆发了社会革命,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革命是一种玉石俱焚的结果,旧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彻底解体,而建立了一种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体制的国家政权形式。在德国和日本,由于土地贵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拥有强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土地贵族依靠手中垄断的强权极力榨取剩余价值,形成了反民主的法西斯主义政治。^[15]

巴林顿·摩尔的观点有很大的市场。受教于摩尔的查尔斯·蒂利对巴林顿·摩尔的解释一度推崇备至,不过他的分析同时也隐含了对现代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尖锐批判。《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是查尔斯·蒂利最重要的代表作,在该书中蒂利指出,在那些片面追求强制集中的国家,由于战争与社会相脱离,战争很难得到持久的资源支持,最终将在国家竞争中落败;那些片面追求资本集中的国家,则过度依赖于雇佣兵作战,亦只能逞强一时。成功的国家则是通过财税体系,将资本力量有效吸纳进国家系统中,使强制与资本相结合。正是这种国家建设模式导致了民主体制的产生,因为吸纳资本是一个资本家与国家谈判的过程,资本的力量越强,资本对于国家权力的掣肘就更加有效。^[16]

同样是巴林顿·摩尔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追随者,迪特里希·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则在民主的动力机制上,提出了与前辈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布朗大学教授瑞斯彻迈耶长期关注职业群体的组织行为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而史蒂芬斯夫妇则致力于工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他们合作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主》一炮打响,成为民主化理论的经典文献。在这部著作中,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开宗明义指出,现代民主是工人阶级推动的。他

们指出,民主化首先就意味着政治平等的增长,对于民主化的研究若是忽视了工人这一角色就离题万里了。露茜·科利尔概括了该书的主要观点:

民主,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因而也是阶级权力平衡的产物。当要求民主的阶级,首先是工人阶级,比抵制民主的阶级更强大的时候,就发生了民主化。抵制民主的阶级拒绝前者的要求和压力,尽管还有余地考虑让其他阶级来创制民主,作为对工人阶级威胁的一种额外的反应。^{[17](P7)}

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认为,民主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正相关的,不过这种正相关性并不说明民主化的推动力量是资产阶级,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促进了工人的组织化程度:“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所以存在联系,是因为它使阶级结构发生了转型,加强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力量,削弱了土地贵族。不是资本主义市场,也不是作为新的支配性力量的资本家,而是资本主义的矛盾促进了民主。”^{[18](P7)}

中产阶级在民主化中是骑墙派,他们有可能支持民主化,也有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这取决于他们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的需要和可能性。农业工人与中产阶级一样是首鼠两端的,他们支持民主与否取决于他们建立自治组织的能力以及他们受统治阶级影响的程度。小乡村的自耕农通常都支持民主,大庄园的佃农则难以动员,在民主化中毫无作为。农业工人则力图组织起来,参加工人组织来推动民主。

与这些阶级相比,工人则是民主化的坚定支持者,因为工人毫无疑问将是民主化的受益者。瑞斯彻迈耶和史蒂芬斯夫妇指出,工人阶级之所以支持民主,在于工人相比统治阶级更追求政治接纳,他们与统治阶级的霸权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工人成为民主化的推动者,还在于工人具备这样的政治能力,这一能力就体现在工人本身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上。

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的研究是基于对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考察,但是结果却令

人失望,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比较软弱,中产阶级在民主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不过他们并未气馁,而是争辩道,中产阶级主导民主化进程,正是拉丁美洲民主化的局限性所在。

对瑞斯彻迈耶等人的研究作出最有力回答的是露茜·科利尔的《民主的道路》。科利尔夫妇长期关注劳工政治,《民主的道路》则由露茜独立完成。她对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的民主化解释提出了尖锐批评,质问:民主化真的是自下而上斗争的结果吗?如果是,那就是被统治阶级从精英手中夺取权力;还是说是自上而下征服的结果?如果是,那就是当权者或是正在兴起但又未掌握政治权力的经济集团追逐政治代理人、加强他们政治地位的结果。

科利尔指出,瑞斯彻迈耶与史蒂芬斯夫妇其实也留意到民主化转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机制性互动,但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偏爱而使这一事实上是最重要的观点恍如雪后鸿踪。科利尔的观点是:一方面工人是“民主”最重要的载体,在民主的成功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工人却是边缘化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精英之间的谈判和策略性互动却是关键的。科利尔坚持民主化进程其实有两个面向,一是自上而下的,一是自下而上的。前者是一种策略互动方法,聚焦于领袖或者精英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后者是一种阶级分析。科利尔坚持两个分析框架,也就是阶级路径和精英—选择路径的并举。前者视民主化为被排斥群体和被压迫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后者视民主化为当权者与民主反对派精英之间策略性互动的结果。早期西欧的民主化进程更多适用于阶级分析,民主确实是由工人阶级推动的;但是二战后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则更多是精英互动的结果,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已经被当局与反对派、温和派与激进派这些范畴替代了。科利尔指出,正是基于欧洲在世纪之初民主化的经验,导致工人的作用被高估了;但是拉丁美洲的民主化进程又导致工人的作用被低估,仿佛民主化过程与工人毫无瓜葛,这在理论上都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工人阶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主化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在新兴工业国的民

主化过程中却边缘化了呢?科利尔的解释是,世纪之初欧洲的民主化进程是渐进的,以投票权的扩大为标志,是逐渐从有限民主向充分民主过渡,工人阶级争取政治接纳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就尤为显要,而衡量民主化最终走向成功,亦以工人争取到投票权为准,民主化便表现为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在1970到1980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却不是这样。科利尔称这场民主化是“再民主化”(Redemocratization),其所针对的不是有限民主制度而是威权制度。此时,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已经深入人心,制度先例也比较成熟,威权国家中民主的欠缺不仅刺激工人阶级,而且激起整个社会力量的反抗。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再是民主化的惟一力量,民主化过程也不那么像是一个以阶级为基础的过程。^{[18](P7)}

总而言之,与过去将工人力量排斥在民主化建设进程之外而加以忽略的理论不同,越来越多学者认识到工人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一个历史实证的考察,更涉及到民主政治本身的性质。如果说民主是资产阶级市民挑战王权而发明出来的政治形式,那么,尽管民主带来了政治上的进步,却注定要在资产阶级支配的社会中沦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宣称“民主是资产阶级统治最好的外衣”。但是,如果说工人阶级才是民主的根本动力,是工人不懈的政治参与扩大了工人自身的政治公民权,普及了工人投票的权利,增进了政治体系的包容程度,那么民主就不能简单理解为资产阶级独占的政治形式,而应看作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政治斗争、增进自身福利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控制了经济领域,实际上该领域的组织运作仍然是高度专制、通过财产继承的世袭制来维持既有权力的,政治领域的民主化俨然成为制约资产阶级经济支配的有力工具。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民主延伸为工人阶级统治的一般政治形式,界定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特征。民主不仅不与工人政治相排斥,更可能成为工人最好的政治斗争工具。

总而言之,对“工人政治”再释义,有助于突破过去将工人的政治角色符号化,或者将工人的

历史地位限定在其社会职业角色的双重局限,从而赋予工人政治更加广泛、深刻的意涵,使其与现代政治的脉理相结合;有助于重新理解工人的政治地位,重拾他们的苦难、激情与力量,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现代政治的起源与本质。须知现代国家的民主、福利体系、社会抗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可以从工人政治这一剖面加以破解。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Charles Tilly,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 潘毅.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
- [5] 迈克尔·布若威. 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M]. 李荣荣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6] 汉斯彼得·克里西等. 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M]. 张峰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 [7] 基姆·穆迪. 产业工人阶级并未衰落[J]. 郭懋安译. 国外理论动态,2004,(5).
- [8]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钰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9] Terry Clark & Martin Lipset. Are Social Classes Dying.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6(4), 1991.
- [10] Andre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 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 [11] 恩斯特·拉克劳,查特尔·墨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M]. 尹树广,鉴传今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 [12] Scott McNall, Rhonda F. Levine, Rick Fantasia ed., *Bringing Class Back In: Contemporary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1.
- [13] John Hall ed., *Reworking Clas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4] Ira Katznelson and Aristide R. Zolberg e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nth-Century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15] 巴林顿·摩尔.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 拓夫等译. 华夏出版社,1987.
- [16]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 [17] Ruth Collier, *Paths Toward Democracy: The Working Class and Elites in Western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8]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责任编辑 王金水

Re-interpretation of Worker Politics

CHEN Zhou-wa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has raised a series of challenges for worker politics, which necessitate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term “worker politics”. By reviewing the classical theory of Marxism, it is clear that workers involved in “worker politics” are given “class” connotation that transcends their occupational group, and represents the universal liberating force. “Worker politics” is not the power relation that simply focuses on a particular occupational group, but rather a new form of politics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life monopolized by the political elite, namely the “alienation” of modern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 of worker politics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so that contemporary Western intelligentsia had proposed the biased idea of “declining worker politics”. In fact, worker politics has never been marginalized; on the contrary, it is experiencing massive revitalization in the world aided by globalization, which requires shift i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for work politics in an objective sense. By analyzing the cross-section of worker politics, we can analyze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cy, thus explore the nature of modern politics.

Key Words: worker politics; class; democracy